



Zhuiqiu lǐxiāng de zujì

追求理想 的足迹

广东青运史研究委员会研究室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追求理想的足迹

广东人民出版社

追求理想的足迹

广东青运史研究委员会研究室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军区政治部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4.53印张 1插页 102,000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册

ISBN 7—218—00095—9 /K·18

*

统一书号 11111·238 定价0.93元

追求真理 奋斗不怠

龙太忠
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

前　　言

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生命却是很短暂的。要想让生命的火花，凝铸在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之上，迸发于共产主义事业之中，流芳人间，造福人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珍惜自己的青年时代，坚毅的迈出人生的第一步。现在出版的《追求理想的足迹》，便是一本青春的颂歌。

这本书的作者，绝大多数是广州军区范围内的老战士，所写的均是个人体验性的回忆文章，内容比较丰富，不少文章情文并茂。其中有的是写自己如何冲破阴霾，投奔红军；有的是写自己离开异国，奔回祖国，走上革命的大道的经过；有的是写自己身陷囹圄，胸怀天下；有的则是写自己由童养媳怎样成长为女英雄……。总之，不管文章如何取材，但都突出地介绍了他们年轻时候一段英勇艰苦的斗争经历，体现了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中，走上革命道路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他们热爱祖国，忠于人民，为了人类的美好事业而不畏艰险和忘我献身的革命风貌。一句话，反映了他们青年时代强烈的爱憎与崇高的理想。正因为这样，他们做出了许多非凡的事，从而使自己由一个极为普通的人变成了一颗颗闪烁着理想之光的星星，使自己生命的火花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放射着熠熠的光彩。

诚然，《追求理想的足迹》并非就是青年的教科书。但可以肯定，广大青年朋友读到它，将会使自己仿佛来到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从中了解祖国和民族所走过的道路，得到

教益和鼓舞，吸取力量和勇气，从而使自己自觉地树立信仰，磨炼意志，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并在人生的道路上，穿过风沙，寻到事业的绿洲和生命的鲜花与清泉，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中，创造出无愧于老战士的英雄业绩。这样，就会把自己变成一颗颗璀璨的明珠，缀成祖国历史上一页又一页的光华篇章，就会用自己生命的火花，把伟大的祖国照得更加通红。

目 录

走向理想的道路	李聚奎	(1)
党，我心中的阳光	庄田	(16)
我早期的革命生涯	陈海涵	(24)
戎马倥偬年少时	赖春风	(34)
放下泥刀拿起枪	欧致富	(43)
哥哥入党我入团	郑贵卿	(51)
最初的追求	张德	(58)
要紧的几步	张海	(68)
难忘的青少年时代	马忆湘	(76)
曲折的道路	王作尧	(87)
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	陈青山	(94)
延安在我心中	杨士斌	(102)
我的文艺之路	唐克	(108)
在战火中成长	李兆华	(114)
不当状元当战士	王仲儒	(123)
游子爱党	谢克	(131)
从黑暗到光明	蔡建宇	(137)
编后记		(145)



走向理想的道路

李聚奎

李聚奎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军事家，195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1928年

参加平江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时代是在战场上度过的。这篇文章描述了他的一些经历和感受，也体现了革命者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信仰，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以及优良的作风。这里发表时，做了一些删节和文字整理。

——编 者

一个人要走上理想之路是要付出代价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有多少志士仁人、革命先烈为了追求理想走上了光明的道路，在痛苦中求索，在流血中追寻，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所以，任何一个人要走上理想之路，都需要不屈不挠的努力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

1904年12月31日我出生在湖南涟源县西坪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母为了讨个吉利，给我取名叫“新喜”。我家共7

口人。我7岁时，父母把我送进本村的私塾读书。此时，正值辛亥年，外面闹得天翻地覆。入学第一天，我们被私塾先生领着拜过孔夫子的牌位之后，便开始懵懵懂懂地念起“子曰诗云”来了。上课时，先生的手边、案前总离不开一把戒尺。学堂里不时响起抽打学生手心的“啪啪”声。我也被打过手心，所以我对先生的那把戒尺又怕又恨。

第二年，我继续上学，但只读了两个多月。有一次，先生挥着戒尺又要打我，我一气之下拾起一块石头向他扔了过去，虽然没打着，但这下可闯了祸，一个毛伢子竟敢还手向先生扔石头。这在先生眼里是大逆不道的事。先生发怒了，把我揪到“至圣孔子先师”的牌位前，罚我跪了半天。我再也受不了这种窝囊气，就逃学了，从此再没进过学堂。

结束了学生生活以后，父亲便让我在家当个帮手，每天放牛、砍柴、割草。到十岁时我就能帮助父亲干些地里的农活了。我十三四岁时，已长得虎虎实实，力气很大，扛犁、耙，播种插秧，样样能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此我和父亲就共同挑起一家生活的重担。那时，我家除耕种自己原有的土地外，还开了些荒地。我一有空就去给别人打零工，赚些油盐和零用钱；冬天农闲时，我还干起挑炭的营生。

我在故乡生活了22年，从童年、少年直到进入青年。在这22年中，中国社会发生的急剧变动，我耳闻目睹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村极端贫穷落后的状况；尤其亲身感受到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盘剥压榨穷人的罪恶事实和从事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的贫苦农民，在饥寒交迫中煎熬的痛苦生活。我在稍懂事的时候就开始感到世上的贫富悬殊是不合理的。但那时我还不懂得为什么发财的人那样发财，穷的人那样穷的原因。我曾天真地梦想，大家都一样多好！村里饱

经沧桑的老人说：“大家都一样，坐轿子的谁来抬？发财的人那是命好。”那时候我还不懂得什么叫理想、什么是革命；更谈不上追求。一个农民哪里懂得了那么多。尽管如此，我也不愿认这个“命”，但也不能判定老人的话是对还是不对。

长期的体力劳动生活虽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吃的好穿的，但却炼出了一副健壮的身板，铸就了一个倔强的性格，使我能够在此后的人生旅途中经得起艰难困苦，挺得住挫折打击。这是我从父母身上继承下来的，也是故乡所给予我的最宝贵的东西。

二

1926年，我22岁。

这一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湖南全省。5月，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首先入湘，战蓝田，攻醴陵，克平江，进长沙，迅速占领湖南全境。接着，又大战湖北的汀泗桥、贺胜桥，歼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北伐胜利进军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城乡各地。

国民革命军一面继续向北推进，一面四处招兵，扩大军队。在离我村不远的桥头河镇，就设有招兵站。九月的一天，我挑炭进镇，见招兵站高悬彩旗，张贴五颜六色的标语：“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身穿灰色军服的国民革命军的士兵，有的向过往群众教唱革命歌曲：“来来来！大家团结起来！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歌声响彻云霄、震人心弦；有的慷慨陈词，历数北洋军阀的罪恶；有的大声疾呼：工友农友们投身国民革命，加入到北伐行列中来。

这一切，都使我耳目一新，被强烈地吸引了。我和本村几个要好的伙伴一起，议论起国民革命的事。大家越说心气越盛，当下就相约去投革命军。那时，在一般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中，“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观念根深蒂固。我们估计参加国民革命军的事不会得到父母同意，就背着家庭人员，趁晚上偷着跑走。

翌日，天不亮，我就和同村的几个伙伴，一口气跑到桥头河镇报名当了兵。报名时，登记的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怕家里寻来当不成兵，便改名为“李聚奎”。从这一天起，“李聚奎”这个名字就伴随我度过了六十年的军旅生涯。

参军后，我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工兵营一连。在长沙训练了约三个月，主要科目是土工作业和射击，训练紧张、严格，也很正规，一丝不苟地进行操练。当时所学的这些东西，在后来保卫井冈山构筑野战工事中都用上了。

大约在11月间，我们工兵营归入湖南独立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我在三营九连当兵。整编后，队伍开至湖北孝感，担任向前方运送装备的任务。

1927年1月下旬，我们返回湖南，驻在常德县。这时，作为全国农民运动中心的湖南农运方兴未艾，四乡农民纷纷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斗争不法地主。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使我们这些农民出身的士兵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痛快，甚至以为实现国民革命的目标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没料到，北伐战争的烽火还未熄灭，蒋介石就在上海叛变了革命，把枪口对准了曾经用鲜血和生命支持了北伐战争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这年5月，队伍由常德开到岳州驻防。不久，就听说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骨干。

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下令解散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悍然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10月间，蒋唐战争（又称“宁汉战争”）爆发了。武汉方面的唐生智为了同蒋介石争夺权力，令所属部队沿长江两岸东征讨蒋。此时的中国，旧军阀还未清除，新军阀又燃起了战火。队伍刚刚返湘，屁股还没坐稳，又忙不迭地同黔军打了一仗。此后，我所在的三营又回到华容县驻防练兵。1928年2月底，三营由华容移驻南县。

此后，湖南独立第一师师长周磐为了加强对三营的控制，就调了他的一个亲戚来我们九连当连长。新来的连长不学无术，处处摆官架子，随意打骂士兵。士兵都很恨他，带枪逃跑的事时有发生，一天晚上，就有18个人带枪跑了。这时彭德怀刚新任一团团长不久，即下令把这个不学无术的连长撤了职，调随营学校的黄纯一来担任九连连长。

我从1926年参加北伐军起，在将近两年的国民革命军的行列中，经历了前后迥然不同的两个时期：前者是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后者则是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绞杀革命的时期。在这两个时期中，我看到我所投身的军队，其性质、作用以及和民众间的关系是那么不同。昨是今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不能不经常引起我的深思和激烈的思想斗争。

三

1928年5月初，我已由二等兵逐步升到了中士班长。随即，我们连成立了一个秘密的士兵委员会，成员有我和其他三、四个人。士兵委员会成立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动士兵闹

饷，要求按月发给薪饷，并补发过去五个月所欠的饷银。

这次闹饷的发生不是偶然，自从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之后，湖南反动当局就肆无忌惮地屠杀工农群众，逃亡在外的土豪劣绅也卷土重来，变本加利地盘剥人民。大小军阀更是由于已经争得了自己的地盘，分到了一块块肥肉而弹冠相庆，早把为国民革命浴血作战的广大士兵抛在九霄云外，他们层层克扣士兵的饷银。国民革命军的士兵同广大工农群众一样，生活十分艰苦，每月不仅没有钱寄回家中供养父母，甚至连买黄烟的钱都没有。一些吸烟的士兵，只好经常利用星期天到车站、码头去散步，拣人家丢下的烟头。有的士兵的父母妻小从老家借钱作路费到部队来探望，可是回去时连买一张车、船票的钱都拿不出来，家属们不得已只好徒步甚至要饭回家。士兵们不满的情绪达到了顶点，整个军营象一堆干柴，随时都可能燃起熊熊烈火。

1928年4月，已是中国共产党员的彭德怀同志肩负着党所赋予的策动一团武装暴动的重任。随之，这个团就逐渐发生了变化：连队成立了“救贫会”，演出了反对军阀豪绅的“活报剧”，进行了一些通俗的宣传；组织了士兵委员会，扩大了士兵管理自己的权力，改善了官兵关系。但是，当时一团有官兵2000多人，而党派到这个团做兵运工作的党员不过是七八个人。要把一支庞杂的旧军队引上革命的道路，困难是很大的。为了启发全团官兵的政治觉悟，一团的党组织利用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同反动派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南县闹饷”就是这些斗争中最重要的一次。

经过一段时间的串连，全团大部分连队的班长们都起来闹饷，并向一些社会团体散发了传单。不久，团部的传令排

长张荣生（共产党员）在南县一个文庙里，秘密地召开了第一次全团中下士代表会议，每连都有代表参加。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张荣生讲了军阀克扣军饷的情况和闹饷的目的及行动计划等，并提出了“不发饷就不出发”的口号。这一口号很快成了大家的共同要求。闹饷的消息传到在长沙的周磐师长那里，起初他仍用过去盛气凌人的口气说：“发饷是上级的事，发就发，不发就不发，不许胡闹。”但是，由于这次闹饷大家团结一致，态度坚决，步调统一，声势越来越大，在社会上也引起反响，把周磐闹得惊慌失措，最后，他也只好让步，答应以他的名义向当地商会借款，给部队发饷。我们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四

南县闹饷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士兵们的情绪有所缓和。队伍开到平江后，全团中下士班长们继续串连，由原来单纯的经济斗争逐步转向政治斗争。

平江是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的地方。县城位于巍峨苍翠的幕阜山下，奔腾不息的汨罗江从城南扬波而过，然后扭头向西，咆哮着注入洞庭湖，自然景色很秀丽。

我所在的部队开到平江，是奉湖南清乡督办署的命令来接替阎仲儒旅的防务，进行“剿匪”、“清乡”的。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万万没有料到，这里竟成了继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之后又一次“威声寒敌胆”的地方。

第一团早在开赴平江之前，即1928年春在南县时就已经开始酝酿起义了，原想起义后把队伍拉往湘西，但当时条件不成熟，到了平江以后，部队接近了毛泽东同志所建立的井冈山根据地，这里又有着比较坚实的群众基础，起义的条件

比过去好多了。但是，当时一团党的力量比较薄弱，而且平江地区的反动势力，除民团外，还有师属的第二团和第三团及师部的政训队，敌我力量悬殊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举行起义，除了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胆识之外，还要有缜密的计划和巧妙的安排。

为了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首要的是迷惑和稳住敌人。那时，我们经常见到彭德怀团长出入县政府。而县长和当地士绅也常到团部“拜访”彭团长，双方打得“火热”。后来我们才知道，彭团长除了不得不敷衍他们对下乡“剿匪”的请求之外，还不时地揭露他们残杀群众的行为，弄得国民党县长和土豪劣绅们张口结舌，有嘴难辩，狼狈不堪。

一团的党组织，为了团结全团广大官兵，作好起义的准备，还着手对这支旧军队进行了一些改造工作，彭德怀当团长后就下了两条禁令：一是取消军官的小厨房，二是取消军官手里拿的打人的鞭子。两条禁令深受全团士兵的欢迎，由于党员在士兵中的实际行动，广泛地影响了许多中下士班长，也得到了士兵们的信赖和爱戴，为起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平江起义还是借闹饷的名义发动起来的。因为闹饷对内可以充分发动全体士兵，培养骨干分子；对外可以蒙住敌人眼睛，给敌人造成错觉。大概在7月初，一团的党组织发动各连的士兵委员会再次进行闹饷活动。这次闹饷同南县闹饷有很大的不同：南县闹饷是以经济为目标的，而平江闹饷是直接为了暴动的；南县闹饷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带有自发性的，平江闹饷则是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同时这次闹饷比南县那一次来规模更大，因为到平江又有两个月没有发饷，闹饷的理由更充足了，更能发动群众了。由于当时的士兵委员会已成为党的外围组织，一团又处于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

闹饷活动仍然是处于半公开的状态。谁是带头人，那更是完全保密的。

7月中旬的一天夜里12时左右，我正在睡梦中，连长的勤务兵突然来叫我到连部去，说是黄连长有事找我。我一进门，只见平时与我暗中商量着闹饷活动的二、三、六、七、九班的班长也在，黄连长马上递给我一杯酒，并说：“李军士，听说你在带头闹饷？”我愣了一下，正想如何回答好，机灵活泼的九班长何静安一嘴插上，代我作了答复：“是的，我们连是李班长负责。”黄连长看出我的紧张心情，就向我们表示说：你们在一起闹饷很好，我也来。听说二连连长李灿是全团闹饷的代表，彭团长也赞成。不过，军队里闹饷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因此，要有计划，有组织，要保守秘密，严守纪律，不是心腹之人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行动。他最后说：“我提议，我们连里就由李军士作为代表，以便和二连李连长联系，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可以负责转达给他，以后你们就可以直接得到他的指示了。”当时，大家都同意连长的提议。这一晚，我们就这样一边喝酒一边交谈了闹饷的问题，一直到天快亮时才散开。从这次和黄连长的长时间接触中，我隐约地感觉到，这次全团组织闹饷，除了要解决经济问题之外，还要解决比经济更为重要的问题，由于当时的白色恐怖异常严重，故又不便问明。我从当了连里闹饷的代表以后，在黄连长的支持下，活动更积极了，不仅在本连活动，有时还到其他连去活动，并经常把活动情况向二连连长李灿报告。

就在我们闹饷活动达到高潮的时候，黄连长突然“病”了。一天下午，我到黄连长的住处去找他，发现他的屋里有一个陌生人，后来才知道，这个人是滕代远同志。他是以中

共湖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来平浏地区巡视工作的，这次来到第一团，带来了湖南省委的指示，沟通了一团和平江党组织的联系，商定了起义的时间和行动计划。在党的领导下，一团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动，很快就要在这个小小的山城爆发了。

1928年7月22日上午11时，黄纯一把我们积极参加闹饷的六个班长找去，对我们说：“暴动的命令来了；就在今天下午1点钟开始行动。”他一边从军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一边继续说：“这是团部刚才派人送来的信”。我们几个人互相把信传阅了一遍。信中规定了我们九连这次行动的任务，信末署着团长彭德怀的名字。举行暴动的消息对我们来说，虽然是意料之中，但也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一时大家都很兴奋。随即认真研究了全连人员的思想情况和本连的战斗任务。大家认为，兵士们对长期不发饷积怒已久，可以做到一呼百应，但是对三个排长、三个班长、两个上士以及司务长的态度还不十分清楚。大家的意见是把他们找来，当面向他们宣布彭团长的命令，如果他们赞成，就允许他们参加；如果他们反对，就把他们暂时扣留起来，待暴动以后再放他们走。决定之后，我们就让勤务兵把他们找来了，黄连长向他们简要地说明了要举行暴动，同时把团长的命令向他们宣布了。这时，除司务长及上士的态度不够坚决外，三个排长都激动地说：你们干的事我们完全赞成，可惜你们没有早告许我们。三个班长也表示积极参加。我们感到他们的态度是真诚的，也就松了一口气。我们连的任务是解决师政训处与特务连。大家说，师政训处和特务连，是平江县城的一个大钉子，如果不能顺利拔掉这个钉子，就会影响整个的行动，必须坚决把它拿下来。最后我们查看了平江县的地图，规定了